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張伯偉 主編

日本漢詩論稿

蔡
毅
著

中華書局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張伯偉 主編

日本漢詩論稿

蔡毅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詩論稿/蔡毅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07.7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張伯偉主編)

ISBN 978 - 7 - 101 - 05757 - 7

I. 日… II. 蔡… III. 漢語 - 詩歌 - 文學研究 - 日本
IV. I313.0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98892 號

責任編輯:王守青

域外漢籍研究叢書

日本漢詩論稿

蔡 毅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80 × 1230 毫米 1/32 · 10¹/₄ 印張 · 2 插頁 · 25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冊 定價: 25.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5757 - 7

總 序

張伯偉

十六世紀以來，在一些西方的文獻中，往往提到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他們認為惟獨自己纔有兩隻眼睛，歐洲人則祇有一隻眼睛。這些記載出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國的伏爾泰也曾謙遜地認同這種說法：“他們有兩隻眼，而我們祇有一隻眼。”用兩隻眼睛觀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為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仁”，本來就是著眼於自我和他者，本來就是在“二人”間展開的。不過，當大漢帝國雄峙於東方的時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謂的“仁政”，實際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圖像。政治上的冊封，貿易上的朝貢，軍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過這樣的過濾網，兩隻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過是自己在他人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

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呢？

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歐洲人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並且紀錄下他們的觀察和印象。於是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逐漸有了一個不同於自身的他者，也逐漸獲得了第二隻眼睛，用以觀察周邊和遠方。不僅如此，他們還讓中國人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不過，這是在中國人經歷了近代歷史血和淚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後的事情。

同樣是承認中國人有兩隻眼，但在德國人萊布尼茨看來，他們還缺少歐洲人的“一隻眼”，即用以認識非物質存在並建立精密科學的“隻眼”。推而廣之，在美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及周邊各地區人的觀察中，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中國，也必然是色彩各異、修短不齊的形象。我們是還缺少“一隻眼”，這就是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正如一些國外的中國學家，曾把他們觀察中國的目光稱作“異域之眼”，而“異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獨具隻眼”。

然而就“異域之眼”對中國的觀察而言，其時間最久、方面最廣、透視最細、價值最高的，當首推我們的近鄰，也就是在中國周邊所形成的漢文化圈地區。其觀察紀錄，除了專門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紀、錄為題者外，現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漢籍，展現的便是“異域之眼”中的中華世界。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

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推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重建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新貌之獲得，有賴於當時的新材料和新觀念，用陳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域外漢籍可大致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但其在今日的價值和意義，已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於“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為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成為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本著這一構想，我們編纂了“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其宗旨一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總之，我們期待著從“新材料”出發，在不同方面和層面上對漢文化整體的意義作出“新發明”。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曾把這兩句詩看

作“浩然之氣”的形容；“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唐代鑑真和尚曾因這四句偈而東渡弘法。我願引以為域外漢籍研究前景和意義的寫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種種分際的交匯，是智慧的“結緣”和“對語”，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斷”的光明事業。

是為序。

目 次

空海在唐作詩考	(1)
韓志和其人其事	(13)
祇園南海與李白	(26)
市河寬齋簡論	(53)
試論賴山陽對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64)
黃遵憲與日本漢詩	(93)
明治填詞與中國詞學	(117)
超越大海的想像力	
——日本漢詩中的中國詩歌意象	(149)
日本漢詩研究斷想	(166)
日本漢籍與唐詩研究	(173)
從日本漢籍看《全宋詩》補遺	
——以《參天台五臺山記》為例	(178)
市河寬齋與《全唐詩逸》	(203)
市河寬齋所作詩話考	(224)
長崎清客與江戸漢詩	
——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	(232)
陳曼壽與《日本同人詩選》	
——第一部中國人編輯的日本漢詩集	(255)
俞樾與《東瀛詩選》	(273)

學術翻譯與文化交流

- 青木正兒原著、王古魯譯著《中國近世戲曲史》書後
..... (302)

星疏月朗，雲淡風輕

- 讀小川環樹《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 (320)

- 後記 (324)

空海在唐作詩考

空海(774—835),即弘法大師,是日本佛教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關於他的研究自古為盛,殆至不可勝數。即使是他作為遣唐使的一員,於唐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元年(806)僅僅兩年的入唐求法活動,有關資料也幾乎被一網打盡,使人頗感無從置喙。然而,現在可以確認的空海在唐期間的四首漢詩作品,即七言《過金心(山)寺》,七言《留別青龍寺義操阿闍梨》,七言《在唐觀昶法和尚小山》,以及五言《在唐日示劍南惟上離合詩》,其實還留有相當多的疑問。也就是說,研究古典文學作品時必須首先解決的三個基本問題:作於何時,何地,為何而作,就空海這四首作品而言,尚屬疑案。限於篇幅,本文僅選取其中的五言《在唐日示劍南惟上離合詩》略作考述,其餘三首,且容作異日之券。

在唐日示劍南惟上離合詩

磴危人難行,
石險獸無昇。
燭暗迷前後,
蜀人不得過。^①

該詩空海《性靈集》雖然未予收錄,但《性靈集》序中特意舉出

① 《拾遺雜集》,《弘法大師全集》第三輯,密教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614頁。

該詩，並云：

和尚昔在唐日，作離合詩贈土僧惟上。前御史大夫泉州別駕馬總，一時大才也，覽則驚怪，因送詩云：何乃萬里來，可非銜其才。增學助玄機，土人如子稀。^①

這篇序為空海弟子真濟所作，但《性靈集》在空海生前即已編成，因此可以說序的內容已得到空海的首肯。

按離合詩本來是一種文字遊戲，基本方法是切取前句首字的偏旁，作為後句的首字，再把剩下的部分加以組合，來構成一個新字，而這個字往往就是這首詩的主題（空海詩為登 + 火 = 燈，馬總詩為人 + 曾 = 僧）。中國現存最早的離合詩是漢末孔融的《離合作郡姓名字詩》（《藝文類聚》卷五十六所收，該卷還收有其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若干離合詩作品）。而如果把話題擴展到拆字遊戲的話，與孔融大致同時代的東吳薛綜嘲諷西蜀張奉之語，亦可納入我們的視野：“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三國志》卷五十三薛綜傳。另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諸葛恪語，作“有水者濁，無水者蜀”）這裏關於“蜀人”的戲語，或許亦為空海所本。可是，離合詩在孔融以後儘管不絕如縷，但直到空海入唐之前，在這漫長的歲月中，離合詩不過是文人興之所到，偶或為之，完全談不上人氣所鍾，流行所至。另一方面，在日本除空海之外，現知最早的離合詩是收於《文華秀麗集》（818 年成書）的小野岑守《在邊贈友》，題下自注“離合”。詩為五言律詩（略有失律），各句首字“班”、“夕”、“衿”、“衣”、“弦”、“弓”、“綿”、“帛”，可離合為“琴絃”二字。

^① 《遍照發揮性靈集序》，《弘法大師空海全集》第六卷，筑摩書房，1984 年版，729 頁。

小野岑守(778—830)比空海小四歲,從年齡上看,空海在入唐以前似乎有可能接觸過這種體裁,但如果考慮到空海入唐時纔三十歲,此前僅為一介學僧,尚未與平安宮廷漢詩人多有過往,而小野岑守僅二十六歲,與空海之間也並無接點,因此這種可能性應屬微乎其微。再看小野之作題為“在邊贈友”,當作於他810年之後任地方官時,其时空海已經歸國,反過來說他是受空海影響,也未可知。何況小野此作亦屬曇花一現,之後又過了大約一百年,纔開始出現收於《本朝文粹》的橘在列的離合詩,以及字訓詩、回文詩等遊戲之作。就是說,空海的這首離合詩,在日本漢詩史上,非惟空前,在相當長的期間亦屬“絕後”,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

問題也由此而生。空海此作,難道是他突然心血來潮,想落天外的產物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又是什麼機緣,使空海對離合詩這一特殊體裁產生了興趣的呢?重複前面的問題,這首詩究竟作於何時、何地,為何而作?解決這個問題,不僅可以正確地理解這首詩的內容,而且可以揭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迄今為止尚不為人所知的新的一頁。下面謹略陳鄙見,聊供一解。

首先是該詩作於何時、何地。既有的研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空海滯留福州時,即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空海乘坐的遣唐使船漂流至福州長溪縣赤岸鎮,直至十一月三日啟程赴長安這一期間內所作。其主要理由為:

一、該詩一題為“靈源深處離合詩”,是因為福州有“靈源閣”,市內鼓山有“靈源洞”。

二、《性靈集》序中馬總的頭銜是“前御史大夫泉州別駕”,泉州與福州同為福建觀察使轄區,故馬總空海之會,應在福州^①。

基於這兩條理由,有的論者更進一步發揮想像,說空海贈詩的

① 林偉功《空海入唐求法福州行止處所新探》,載《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對象劍南惟上也在這時來到了福州，空海與惟上以及橘逸勢（同為遣唐使團成員）一起遊覽靈源洞時，看到那險峻陰暗的山路，便作了這首離合詩^①。

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能成立。

第一，“靈源深處”這一詩題最初何時出現，目前尚難確認，但至少平安時代關於空海的所有資料，都沒有這種說法。這顯然是後人所加，故不足為憑。

第二，馬總在“泉州別駕”任期之內，是否有可能見到空海。先看《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馬總傳的記載：

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闢為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總坐貶泉州別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總，從事穆贊鞠總，贊稱無罪，總方免死。後量移恩王傅。元和初，遷虔州刺史……

從這段行文來看，馬總“量移恩王傅”的時間，是否還在柳冕福建觀察使任期內，未可遽斷。檢權德輿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一日作有《答柳福州書》^②，這樣空海等漂流至赤岸時，柳冕還在任。其後柳冕因病辭任，而新任觀察使閻濟美尚未到任，故空海等人赴長安的申請直至十月仍未得批准。又《新唐書》卷八十二宗室下云：“連為恩王……並開府儀同三司，然不出閤。”即恩王一直住在長安。馬總既然“量移恩王傅”，就應該也在長安。然據元稹《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東道觀察等使薛公神道碑文銘》，救馬總於死地

① 村上春次《空海入唐的足跡》，青葉圖書，1987年版，159頁。

② 《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一，編年據蔣寅《權德輿作品繫年》，《大曆詩人研究》下編所收，中華書局，1995年版，695頁。

者，不是穆贊，而是薛戎。其時薛戎為泉州刺史，柳冕命其加害馬總，薛戎“不忍陷，冕怒，並囚之。值冕病，俱得脫。公由總以義聞”（《全唐文》卷六百五十四）。據此則馬總離泉州，應在柳冕去職之後。《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薛戎傳則云：“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冤，乃上其表，發書諭冕，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江湖間。後閩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明確表示薛戎被釋還在柳冕任職之時。可是《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四薛戎傳又云：“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說法與元稹之文相近。綜上所述，馬總、薛戎的免罪是否在柳冕在任期間，尚難斷言，但至少可以說不會在閩濟美繼任之後^①。

退一步說，即使馬總當時還在泉州別駕任上，以遷謫之身，復遭上司問罪，卻能夠自由自在地會見身份尚未判明，實際上處於監禁狀態的日本使臣，也相當不合情理。須知空海參加的以藤原葛野麻呂為大使的遣唐使團，在航海途中遭難，同行四艘船有兩艘去向不明，而所攜帶的日本國書等證明文件均在那失蹤的兩艘船上，無以自明，因而受到福州地方有司的懷疑，“封檢舟船，追卻人徒，居之濕沙，輒加冤陵”（《高野大師御廣傳》）。在這進退維谷、一籌莫展之際，由空海代筆，以藤原大使的名義，向新任觀察使閩濟美呈交了請願書（即《為大使與福州觀察使書》）。結果藤原大使雖獲准西上，空海自己卻“不許隨使入京”，無奈之下，空海又作《與福州觀察使入京啟》，再度請求。在這兩篇文章裏，空海充分展示了他的漢文功力，言辭懇切，據理力爭，終於得以隨大使同赴長安。在這種狀況下，就空海而言，也幾乎沒有會見當地閑客的餘裕。

此外，前引《性靈集》序中馬總的職銜“前御史大夫泉州別駕”，

^① 參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一五三江南東道泉州“穆贊”、“薛戎”條，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2193頁。

也有疑問。據現有資料，馬總最初任御史大夫，是在元和八年(813)（據《舊唐書》憲宗紀，李宗閔《馬公家廟碑》），而貶為泉州別駕之前並沒有這種經歷。因為“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亂以後，基本上成為一種虛銜，但任官若非節度使以上，則一般享受不到這份光榮。元和八年空海早已回國，《性靈集》的成書則更在日天長九年(832)之後，因此馬總榮任“御史大夫”一事，是空海回國後聽說的傳聞，還是原屬誤記，現在難以確認。據李宗閔《馬公家廟碑》（《全唐文》卷七百十四），馬總的曾祖馬頴曾任“御史尚書兵部郎”，空海的誤認也許由此而來。如果我們對“御史大夫”姑且存疑，而僅保留“前”字的話，馬總則為“前泉州別駕”，說明他與空海相見已在此任之後，這樣上述的考證就又可以增加一條證據。

第三，“劍南惟上”有無可能去福州，並見到空海。

在現存史料中，可以相信的關於惟上的記載只有三條：一是上述《性靈集》序，一是空海的《大唐青龍寺故三朝國師惠果和尚之碑》，一是吳慤的《惠果阿闍梨行狀》。綜合參考後世的有關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的，祇有惟上與空海同為惠果弟子，而找不到任何他曾經到過福州的蛛絲馬跡。實在難以想像，一個出身於中國內陸蜀地的僧人，會毫不相干地來到遙遠海邊的福州，去見一個素昧平生的日本僧侶，甚至於和他一起北上長安，同門修行。如果這樣一種極其特殊的因緣確實存在，空海的大量詩文中，總不至於沒有一語道及此事吧？

以上不憚辭費，反復說明空海的離合詩不可能作於福州，為的是回答本文最初提出的“何時、何地”特別是“為何而作”這一疑問點。空海為什麼要寫這首離合詩？其背景究竟是什麼？他困居福州時，一籌莫展，其心情之鬱悶，可想而知。這一期間的空海作品，除了前文提到的兩篇上書外，別無遺存。離合詩這樣的閑情逸致之作，對其時其地的空海來說，應該是既無緣由，也無興趣。相反，如

果是在日後的長安，空海則極有可能與離合詩這一聞所未聞的詩歌樣式適逢其會，並擦出耀眼的火花。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們必須注意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在空海抵達長安前一年，唐貞元十九年（803）秋，以所謂新臺閣詩人權德輿爲首的文人唱和集團，掀起了一陣小小的離合詩以及其他遊戲詩體的創作熱潮。其成員爲權德輿、張薦、崔邠、楊於陵、許孟容、馮伉、潘孟陽、武少儀等八人，被離合的文字爲“思張公”、“私權閣”、“詠篇”、“效三作”、“好”、“五非惡”、“詞章美”、“才思博”。這些作品收於《權載之文集》卷八，《全唐詩》則分隸于個人名下。我們知道，在中國詩歌史上，離合詩儘管早已出現，但至此時爲止，一直是文人率爾操觚的即興之作，如此眾多的官僚文人的集體唱和，尚屬首次。蔣寅的《大曆詩人研究》對這一現象已作了細緻的分析，指出這是顏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中與幕下文士所作浙西聯唱遊戲體詩風的延續，它的出現，意味著以權德輿爲代表的臺閣體詩風已陷於困境，詩壇正醞釀著新的變革。蔣寅從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序言對《性靈集》序的引用，也注意到馬總與空海的離合詩唱和，但因為缺乏資料，這和權德輿等人的離合詩創作是否“偶然的巧合”，他認爲尚難斷言^①。蔣寅的慎重，正爲本文留下了進一步探討的餘地。我覺得，如果綜合考察空海的在唐行跡，可以說這非但不是偶然，而毋寧說是一種必然。

首先，空海在長安兩年間的積極活動，很可能促成了他與離合詩熱的遇合。他“歷城中訪名德”（《御請來目錄》），與文人墨客廣爲交遊，“籍甚滿邦，緇素仰止。詩賦往來，動剩篋笥。遂使絕域寫憂，殊方通心。詞翰俱美，誠興東方君子之風”（《性靈集》序）。據說他還得到了德宗皇帝的親筆宸翰，承順宗皇帝賜予菩提實念珠，

^①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上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428頁。

如此殊榮，實非此前日本留學僧可望其項背。祇要看看空海歸國後所呈《御請來目錄》中記載的文物、經卷名目，就可以知道他蒐集了多少大唐文明的精華。而且，他在作為僧侶親訪佛教經典的同時，還作為一個文人，對唐代文學典籍作了廣泛的涉獵，《文鏡秘府論》這一作詩法的集大成之作，即可見其鑽研之精深。因此，以空海敏銳的藝術觸覺，對當時文壇最為時髦的離合詩熱，當不會毫無關心。

其次，權德輿等人的赫赫大名，也可能導致空海的追慕，乃至拜晤。權德輿身為禮部侍郎，連掌貢舉，故成為貞元後期至元和年間的文壇盟主，其一舉一動引人注目，應為理所當然。空海在長安與劍南惟上一起修行的場所，主要是青龍寺，而權德輿於空海抵長安的前一年，貞元十九年（803），正作有《早夏青龍寺致齋憑眺感物因書十四韻》詩^①。詩題“致齋”，指祭祀前的齋戒，首句“曉出文昌宮，憩茲青蓮宇”，似云此為常遊之地。詩題自注“寺壁有舅氏庶子詩”，據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庶子”乃崔造，貞元初卒^②，故權詩末嘆云“遺韻留壁間，淒然感東武”。由此推測權德輿和青龍寺有某種特殊的關係，當非無據。再者，權德輿集中與僧侶往來之作甚多，其中再添上一個空海，也沒什麼奇怪。至少可以說，空海因青龍寺而知權德輿之名，進而讀過權德輿的離合詩等作品，應該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離合詩唱和集團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楊於陵，也和空海有過直接的交往。《性靈集》卷五《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啟》，就是寫給時任浙東觀察使楊於陵的。雖然這已是空海離開長安回國途中之作，其贈惟上離合詩此前已經問世，但文中說楊於陵“且儒且

① 《權載之文集》卷六，《全唐詩》卷二二五。編年依據蔣寅《大曆詩人研究》下編，690頁。

②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485頁。